政治科學論叢／第 81 期／民國 108 年 9 月／頁 31-68

武裝部隊的忠誠與團結對內戰發生之影響*

陳秉逵**

摘　要

本文檢視政府與武裝部隊的關係對內戰爆發的影響。政府所掌握的壟斷性武力是嚇阻與鎮壓叛亂的主要工具。武裝部隊是否願意服從政府指示，爲政府奮力作戰，可用於衡量政府鎮壓內亂的能力，也正是潛在叛亂份子推斷起義是否能成功的重要考量。當武裝部隊擁有的自主性越高，或是部隊內部派系傾軋，都會削弱國家鎮壓叛亂的能力，潛在的叛亂份子若推斷政府無力號令武裝部隊，便可能趁機發動內戰。本文分析 1946 至 2014 年各國政府與其武裝部隊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若武裝部隊曾發生抗命、曾發動軍事政變、或內部有對立的情形，國內較容易發生武裝叛亂。本文結論指出，嚇阻武裝叛亂有賴於武裝部隊與政府的緊密結合，潛在叛亂份子對於政府動員武裝部隊的能力較爲敏感，而非武裝部隊的數量或裝備。

關鍵詞：武裝部隊、內戰、文武關係、資訊不對稱

---

* DOI:10.6166/TJPS.201909_(81).0002
本研究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編號：MOST 106-2410-H-004-002），作者感謝 Peter White 在研究構想與設計的協助，並感謝匿名審查人與編輯的專業建議與指正。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助理教授，E-mail: pkchen@g.nccu.edu.tw。

收稿日期：107 年 7 月 27 日；通過日期：108 年 9 月 4 日

臺灣人文及社會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內戰爲國家內部的武裝衝突。冷戰結束後，美蘇在各地相繼撤出軍事援助，曾經接受大國裝備與訓練的武裝份子，經由政變或武裝叛亂挑戰中央政府，使的內戰戰火蔓延至各大陸，至今仍是重要的國際問題。以 2018 年爲例，當年度全世界就有 50 場正在進行的內部衝突，內戰不僅限於一國國境，叛亂份子會利用鄰國做爲基地，外國勢力也可能介入內戰，在上述的 50 場內戰中就有 18 場有其他國家參與（Pettersson et al., 2019）。冷戰後激增的內戰數量背後代表數以百萬計的死傷，對社會秩序與經濟發展帶來毀滅性的破壞，衝突使人們流離失所，難民跨越國境造成鄰國困擾，影響國家間的關係。因此，內戰爲何爆發？在什麼情況下容易爆發？各國可以做哪些衝突管理行動來防止內戰，向來爲學界關注的研究問題。內戰爆發並非偶然，武裝叛亂是有組織、經計畫的行動，必須有足夠的人員、武器、以及可靠的財政支援才能有效挑戰政府。多年來學界關注的焦點一向爲反叛者掀竿起義的結構性條件，包括他們不滿政府的原因、如何募員、爭取金援、獲取裝備、或是利用不同戰術與政府對抗等等。

本文試圖從政府的角度去探究內戰爆發，探討政府的行動對準備發動內戰的潛在叛亂份子有什麼影響。政府爲維持統治、穩定社會秩序，通常以武力去嚇阻潛在的叛亂份子。不管是政治異議份子或是分離主義者，國家會盡力阻止他們集結、獲取資源，防止他們以武力推翻政府。要達到此目的，就要有足夠的武裝力量去威嚇、搜捕、或鎮壓這些反政府人士。由於武裝叛亂是由潛在叛亂份子掀起，因此他們對於國家強制性武力的瞭解，就會左右他們掀起叛亂的決定。當他們認爲政府的鎮壓能力很強，武裝叛亂就很可能被迅速鎮壓，因此潛在叛亂份子不會鋌而走險。反之，當政府強制力虛弱時，潛在叛亂份子就可能趁機推翻或脫離中央政府。

本文進一步剖析何謂政府的強制性武力。一般研究認爲政府所指揮的武裝部隊不僅是消弭叛亂的利器，也是捍衛政權的先鋒，因此兩者休戚與共。武裝部隊的數量或是裝備優勢，往往用來代表國家鎮壓的能力。潛在叛亂份子的人員與裝備往往處於劣勢，戰鬥員鮮少受過專業訓練，一般而

臺灣大學圖書館

言發動武裝叛亂是相當冒險的舉動。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最好的叛亂時機，除了他們必須準備充足外，最好能等待政府軍準備不足或是戰鬥意願低落的時機。本文針對此問題做出補充與實證貢獻，武裝部隊與政府的利益不總是一致，與叛亂份子一樣，武裝部隊也有可能對政府產生不滿，更可能反過來攻擊政府。而兩者之間的分歧，會影響政府的鎮壓能力，儘管武裝部隊人數眾多、裝備精良，如果他們不聽從政府去搜捕、鎮壓潛在叛亂份子，或是無心保衛政權，他們就不會對武裝起義造成威脅。研究結果顯示，潛在叛亂份子不僅在乎他們有沒有能力掀起叛亂，還會觀察政府有沒有能力鎮壓他們的叛亂，他們判斷的要點並非政府武裝部隊在人數裝備上的優勢，而是這些部隊是否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因此，當一個國家內部出現政治動盪時，觀察家不僅應該瞭解哪些族群、利益團體、反政府人士可能會掀起叛亂，更應該去評估政府能否阻止叛亂發生。此發現對第三方管理衝突也有啓示，若第三方試圖阻止內戰爆發或重啓，就必須確保合法政府有鎮壓叛亂的能力，使反政府人士不便輕易發動內戰，第三方也可以適時削弱政府所控制的武力，使叛軍更有籌碼逼迫政府談判或遵守之前簽訂的和平協議。

貳、內戰與國家鎮壓能力

對於內戰的發生，學界一般將各種動機歸因爲人民日益積累的宿怨（Cederman et al., 2011；2013；Thyne, 2006），或是潛在叛亂者擁有足夠的機會脫離政府（Collier, 2000；Collier & Hoeffler, 2002；2004；Rustad & Binningsbø, 2012）。國家預防與鎮壓武裝叛變的能力在這兩種假說中都發揮作用。國家所擁有的強制性武力，在此簡稱爲國家武力，代表政府掌控社會秩序的能力，是維持政治系統穩定的要素（Huntington, 2006）。現代國家的形成仰賴強大的國家機器與穩定的社會控制機制（Gurr, 2015；Malešević, 2010；Moore, 1993；Skocpol, 1979；Tilly, 1975），爲建立這種強制力，國家設立常設武裝部隊，用來預防內部衝突的武裝化、威懾國內反抗勢力，並樹立政府威信（Walter, 2006）。國家武力越強，越能阻止叛亂勢力動員群眾以及發動內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除維持強而有力的武裝部隊外，國家的經濟實力可作爲培養武力的基礎，政府會運用國家的稅收、天然資源收入、推動經濟發展等方式，用經濟力量建設國家機器，以維持足夠的社會控制機制來阻止反政府人士推翻政府，通常政府會建立治安系統來維持社會秩序，協助政府搜索潛在反叛者、打擊反政府宣傳與動員、掌握與分析潛在叛亂份子動向等。國家治理的權力（如警察與戶政單位）越能有效地滲透至偏遠地區，越能嚇阻當地的反叛勢力（Buhaug, 2010；Fearon & Laitin, 2003）。

政府可以透過良好的治理減輕內部衝突的壓力（DeRouen & Sobek, 2004；DeSoysa & Fjelde, 2010）。倘若政府能解決資源分配衝突以及改善人民生活，便可以不依賴武力來降低武裝叛亂的可能性。但是無法建立強制武力的國家，往往沒有改善治理的能力。由於政府需要武裝部隊的保護，在資源有限的狀況下，政府傾向建立可靠的武裝部隊建立統治，因此武力通常是政府最注重發展的部分。國家武力同時具有威嚇與輔助國家治理的作用，而武力虛弱，無法建立內部秩序的脆弱國家（fragile state）或失敗國家（failed state），常成爲孕育內部衝突的溫床（林佾靜，2014），這些國家不僅無法建立有組織的軍事力量，也無法有效提供人民公共財，在缺乏國內各群體的忠誠下，國內分離主義常演變爲武裝叛亂（Roessler, 2011）。

對於潛在叛亂份子而言，國家鎮壓能力代表一種政治結構的機遇（political opportunity），不論人民積怨多深，或是潛在叛亂份子獲得多少反叛的資源，他們都必須面對國家武力。對於潛在叛亂份子而言，當政府鎮壓能力相對較弱時，叛亂者就可趁此機會發動武裝叛亂（Gleditsch & Ruggeri, 2010；Sobek, 2010；Tilly, 1978）。而強大的國家武力加深集體行動的難題（Olson, 1971），使招募同志更加困難，由於叛亂成功的機會較低，吸引外國援助的誘因也就較低。

在內戰研究中，對國家武力的估算通常基於軍事人員數量（Singer et al., 1972），也有文獻針對武裝部隊享有的資源來估算（Lacina, 2006），兩者都專注於武裝部隊的質或量。然而，武裝部隊數量或裝備是否眞的能代表政府所支配的武力？過往研究常將武裝部隊視爲與政府一體，政府將國家資源支持武裝部隊鎮壓叛亂，而武裝部隊忠實執行政府的命令，許多文獻都將內戰中的叛軍與政府軍的數量對比，作爲研究內戰爆發或持續的基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礎（Clayton, 2013；Cunningham et al., 2009；Huth & Aronson, 2017；Lawrence, 2015）。這些論述背後的邏輯在於，武裝部隊與中央政府的命運緊緊相連，兩者共存亡。確實，政府與武裝部隊的關係通常相當緊密，政府幾乎總是將資源優先分配給維護治安與國家安全的人員，除換取他們的忠誠之外，亦保障他們執行任務所需的武力，保衛政權不墜。武裝部隊因此聽從政府號令，協助政府維持國內秩序，以換取財政保障、新式裝備或是個人福利。因此在面對內亂時，兩者立場應該一致。

但是武裝部隊往往是具自主意識的行爲者。雖然政府與武裝部隊相互依賴，但由於軍隊持有的武力可隨時指向政府，使得兩者不見得總是相處融洽，互賴的背後存在相互牽制的共生關係，當兩方關係不睦，牽制的重要性就大於互利共生。在面對國內叛亂時，武裝部隊可能爲維護自己利益而不願聽從政府號令。當政府想要以武力鎮壓叛亂時，武裝部隊可能消極打擊叛軍，不願認眞作戰，他們甚至可能反過來協助叛軍反抗政府統治。

本文剖析國家武力的衰落如何對內戰爆發產生影響，著重在潛在叛亂份子如何理解國家武力，本文指出，政府對武裝部隊的控制力會影響其嚇阻叛亂的能力，潛在叛亂份子可由兩個面向觀察國家鎮壓叛亂的能力：(1) 政府與武裝部隊的關係以及 (2) 武裝部隊內部的紛爭。對政府不滿的潛在叛亂份子以此作爲發動武裝鬥爭的重要依據。國家武力的削弱與分裂，具體呈現在政府對武裝部隊的控制力上。同時，當一般民眾對中央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可靠性出現存疑，就有利於潛在叛亂者動員叛亂，武裝反叛成功機率因此提高，使的潛在叛亂者更有意願發動武裝衝突。

下文以量化分析檢視 1946 年至 2014 年發生的內戰，佐以兩個案例討論。實證結果顯示，緊張的文武關係與軍隊內部派系傾軋導致內戰發生機率增加。無法有效掌握武裝部隊的國家，叛亂更容易乘勢而起。相反地，越能約束武裝部隊，有效將國家武力滲透至社會各個角落的國家，越能預防與嚇阻內部叛亂。而政府部隊的數量並不能嚇阻武裝叛亂發生。以下將由兩個面向討論武裝部隊如何影響潛在叛亂份子的判斷。首先討論政府與武裝部隊之間的關係，此關係代表國家對於武裝部隊的掌控力；次而討論武裝部隊內部的分裂，探討內部不合對政府鎮壓叛亂的不利影響。此二者往往相互影響，互爲因果，兩種現象也可能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中。兩者

臺灣大學圖書館

都會增加潛在叛亂者發動武裝叛亂的意願與信心，使的內戰更容易爆發。

參、文武關係與反叛者意向

武裝部隊是政府穩固政權的主要工具，但兩者並不總是和睦，武裝部隊可能不對政府效忠，政府則時時擔心被武裝部隊推翻。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相關研究指出，軍官團（officer corps）與文人政府經常處於對立關係（Huntington, 1957；Janowitz, 2017）。從關於政變（coup d'état）的研究可看出，武裝人員的利益並不總是與中央政府相同。當政府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時，他們本身就是政權的威脅（Feaver, 1999；Londregan & Poole, 1990；Powell & Thyne, 2011）。政府一方面培養武裝部隊以預防內亂，一方面也擔心軍官團勢力過大而不受控制。政府通常試圖以經濟誘因換取武裝部隊的忠誠（Powell, 2012）。但是政府分配資源的能力受到經濟條件限制，即使政府設法滿足武裝部隊的需求，他們對政府的效忠取決於部隊生存是否受到威脅，在面臨國外威脅下，武裝部隊較有意願與政府合作，兩者共依共存的關係更緊密（Desch, 2001）。

但有內亂風險的國家，通常缺乏讓政府與武裝部隊緊密合作的條件。在內部威脅升高，而外部威脅不變或不存在的狀況下，軍官團更有能力與政府討價還價，要求更多的資源與政治影響力。為制衡武裝部隊，政府發展制度化機制，穩固對武裝部隊的指揮權，透過軍事組織改革，以輪調、晉升、親族控制、分散兵權等方式防止軍官團坐大（Biddle & Long, 2004；Bruneau & Matei, 2008；Quinlivan, 1999）。倘若政府無法靠治理遏制軍官團，便需要透過政治手段平衡武裝部隊的力量，有關政變預防（coup proofing）的討論便指出，政府透過設立不同的軍事組織，來平衡武裝部隊內部各派系的勢力（Belkin & Schofer, 2005；Pilster & Böhmelt, 2011；2015）。

文武關係緊張顯示政府對其生存感到不安，政府掌控武裝部隊的能力不足，政府施政也很容易受武裝部隊制肘。一個國家的文武關係若陷於緊繃，武裝部隊的自主性便提高。政府對武裝部隊的忠誠度出現疑慮，無法善用武力進行社會控制，而武裝部隊成員也會與政府討價還價，以抗命做要脅。武裝部隊會觀察政府維持政權的能力，一旦政府喪失人民擁戴，部

臺灣大學國發所博士論文

隊領導人可能拒絕執行政府號令，或陽奉陰違，不貫徹政府命令。違抗政府命令對武裝部隊來說是保存實力的方式，特別是當鎮壓叛亂風險很高，或是某些部隊希望其他部隊去承擔行動責任時，拖延或是拒絕命令就越可能發生。

當武裝部隊無法寄望政府持續提供完善的財政或安全保障時，他們可能試圖脫離政府的管束，依自身利益行動。他們可假政府之名向社會進行掠奪，以確保自身的生存發展（Bates, 2008）。在武裝部隊與政府交惡，或是政府不得人心時，武裝部隊不僅可發動政變取代政府，也可以脫離政府擁地自重，成爲地方軍閥。他們更可能與叛軍合作，反過來與政府作戰。

文武關係與內戰爆發之間的連結，主因不在政府或武裝部隊，而是國內潛在的叛亂份子，內戰是由叛亂者發動的，而政府與武裝部隊的關係會改變叛軍對於政府軍實力的判斷，主要影響有兩個層面：第一，緊張的文武關係讓政府鎮壓叛亂的能力受到限制，由於武裝部隊是國家一部份，政府對於他們的作戰能力、表現、忠誠度都最清楚。在不信任武裝部隊的情況下，政府只能調動與政府關係最好的部隊緊守重要城市與戰略資源。結果政府的用兵地點與時機均受到限制，無法有效打擊叛亂團體，或是無法控制潛在的叛亂地點。

第二，政府所控制的武裝部隊對反叛方的動員力量有所影響。越強大的武裝部隊，展現出的嚇阻力量越強，越容易阻止民眾參與反政府武裝活動，因爲參與叛亂的代價提高，反政府份子面臨集體行動的難題，每個潛在的反叛者都希望其他人去發動叛亂，使招募叛亂勢力面臨困難（Jenkins, 1983；McAdam, 1999；McCarthy & Zald, 1977；Tarrow, 2011）。若政府遲遲無法建立可信賴、能作戰的武裝部隊，叛亂團體會更容易集結，也更有意願挑戰政府。

此處必須強調的是，對於武裝部隊的軍事能力，政府與民眾（潛在叛亂份子）通常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只有政府最清楚武裝部隊的人員、裝備、訓練狀況、機動性，政府理應最瞭解自己的社會控制能力，更會透過武裝部隊去探查爆發內亂的可能性。一般而言，民眾無法準確預估政府鎮壓叛變的能力，政府通常營造出武裝部隊不容輕易挑戰的印象，使一般人認爲武裝部隊裝備齊全、訓練精良，這種印象往往是政府得以實施社會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控制、預防內亂的重要因素。但是文武關係緊張會改變人們的看法。文武關係通常是公開資訊，武裝部隊與政府的摩擦可見於外交政策、國防方針、軍事改革等等公共議題上，兩者不合的證據往往可見於新聞中。人們可以透過文武關係觀察政府是否有能力控制其武裝部隊，若武裝部隊曾經抗命、或是政府領導與軍事領袖有歧見，這都會削弱人民對政府鎮壓叛亂能力的認可，產生政府正處於虛弱狀態的印象。在國家動蕩不安之際，也可能有一些武裝部隊成員脫離政府、或發聲反對政府，武裝部隊離散與政府控制力減弱，造成民眾對武裝部隊的可靠性出現存疑，當民眾認爲政府無力或無暇應付武裝叛亂時，他們願意拿起武器反抗政府的意願也就越強。

以上討論顯示，文武關係緊張的國家爆發內戰的可能性越大。當文武關係良好，政府能有效指揮武裝部隊時，武裝部隊對政府忠誠度高，部隊能發揮最有效率的作戰能力，並且在承平時期監控與逮捕潛在叛亂份子，叛亂團體就越不敢輕易發動內戰。潛在叛亂份子在招募成員上也會遇到困難，民眾看到武裝部隊徹底執行政府意志，打擊任何反政府勢力，就會怯於加入起義。反之，若政府對武裝部隊控制力弱，甚至無法確保武裝部隊會執行政府命令時，民眾認爲政府無力應付武裝叛亂，他們反抗政府、加入武裝叛亂的意願也就越強。反政府人士會更有意願起兵，招募人手也會更加容易。

假設 1：政府與武裝部隊的關係若處於緊張狀態，潛在叛亂份子發動內戰的機會越高。

肆、武裝部隊內部分裂與叛亂

武裝部隊本身的作戰能力也受到內部關係的影響。軍備武力、人員數目、訓練素質固然是直接影響鎮壓能力的要素，武裝部隊是否能作爲一個整體鎮壓叛亂，也會影響到其作戰能力。部隊內部如有同儕不合，彼此爲爭奪主導權而針鋒相對，或是相互推卸責任，不肯配合作戰，那麼部隊預防與應變叛亂的力量就會分散。

部隊無法統一作戰，往往與政府有直接關係。政府理應不希望武裝部隊內鬥，但是當武裝部隊忙於內鬥，他們就無法威脅政府，甚至會更願意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聽從政府號令以獲取更多資源，因此政府有時會在武裝部隊內部建立不同的軍事組織，並鼓勵組織間競爭。軍隊內部派系的鬥爭雖使政府免於政變威脅，卻也埋下派系間拒絕合作的種子，損及部隊的作戰能力，使部隊內各派系爭功諉過，各派系不願合作的結果使政府無法應付內亂（Powell 2014）。[1] 各派系對政府的忠誠也不一致，政府通常能掌握某些內部派系，而與那些不願臣服於政府的派系保持亦敵亦友的關係，有時武裝部隊只與政府維持對等的夥伴關係，而不眞正臣服於政府號令之下。

對於潛在叛亂份子而言，派系傾軋同樣是可觀察的狀況。誠然，武裝部隊的內部事務一般不是公開資訊，一般人對於部隊內部的人事調動、指揮權移轉、資源分配不見得能全盤掌握。但是潛在叛亂份子能觀察重要軍事領袖之間是否不合，內部競爭的消息很容易傳出。尤其當這種競爭非常激烈的時候。武裝部隊可能會爲保有自身的優勢而不願意投入戰鬥，或是爲了爭取更多政府資源而反對其他派系參戰，這些資訊難以對大眾掩飾。比如 1930 年代日本陸軍內部兩大派系相爭不下，最後引發二二六事件，輿論譁然；又如日本陸軍與海軍自日俄戰後就開始分歧，中日戰爭期間，兩者的摩擦嚴重影響太平洋戰爭中的戰術合作。因此叛亂份子同樣可觀察武裝部隊內部不合，趁隙發動叛亂，並且可能試圖進一步離間武裝部隊，以分散他們的鎮壓力量。

內部派系林立不見得是政府刻意造成的結果。政府若無法在武裝部隊中建立威信，而是靠談判或利誘將武裝部隊納入麾下，那麼這些武裝部隊很可能與政府持續維持緊張關係。內戰結束後的和平協議以及安全部門改革（security sector reform）經常遇到這樣的困境，叛軍在談和後納入政府軍，但是由於過往交戰的仇恨、或是叛軍仍然據守原本的根據地、或是政府實施和平進程的作爲不足，戰後改革安排不見得能消弭政府與叛軍之間的宿怨，叛軍與政府間無法平息緊張關係，雙方的承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日趨嚴重，如果叛軍認爲擔心自身安危，或認爲被不公平對待，他們很可能再次舉兵反叛（Derouen et al., 2009；Toft, 2009）。

[1] 爲因應這種損失，政府會採取加強武裝或是締結同盟來應付外部威脅（Brown et al., 2016），但是這類方法並不適合應付內部派系的不合。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政府內部不合也可能引發武裝部隊的內部分裂，政爭可能使政治菁英分別與武裝部隊中的不同派系合作，政治衝突加上武裝部隊作爲後盾，使政治衝突升級爲武裝衝突，政府分裂直接導致武裝部隊分裂，支持反對派的武裝部隊變成叛軍。在這種情況下，內戰爆發來自於政府自身的分裂。但是政府鼓動的武裝部隊分裂，同時也鼓勵了分離主義者發動內戰脫離政府管轄，政府內部爭端並非秘密資訊，尤其當政治衝突白熱化的時候更是如此，當叛軍推測國家武力即將分裂，國家鎮壓叛亂的實力必然下降，那麼叛亂的可行性便大增，叛軍發動內戰的可能性就更高。

假設 2：政府武裝部隊內部有越多對立的派系，潛在叛亂份子發動內戰的機會越高。

伍、研究方法

一、資料與依變項

本文採用量化分析驗證上述假設，所使用的資料庫爲跨國時間序列資料（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涵蓋 1946 年至 2014 年所有國家。觀察單位爲國家 1 年。完整國家列表與年份由 Newgene 軟體生成，總共 9,620 個觀察值（Bennett et al., 2017）。依變數爲內戰爆發，採用 UCDP 的衝突資料。該變數意義爲該年發生死亡人數大於 25 人的內部衝突，並且距離上次衝突至少相隔 1 年。這可避免將持續發生的衝突列入計算，但是會計入曾經停戰卻又復發的衝突（Gleditsch et al., 2002）。

二、自變項

假設 1 是關於政府與武裝部隊關係。一般探討文武關係的文獻會從國家內部的結構性因素出發，推測兩者之間否存在不信任，除過去政變記錄是最直接的觀察方式之外，軍隊的政策影響力、軍隊服從性、政府對軍隊的監管都可以顯示文武關係不佳，而軍事支出的增減、軍事預算的分配、政體、國家安全威脅等因素則導致文武關係惡化（Feaver, 1999）。但這些因素多半無法爲潛在叛亂份子察覺。因應本文理論架構，假設 1 的自變項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必須讓潛在叛亂份子能明確觀察，影響他們起義的判斷，更重要的是，此變數最好能與武裝部隊執行命令的意願相關。武裝部隊可能公開批評政府的軍事發展政策，但是這可能不影響它們鎮壓內亂的意願。假設 1 的自變項需要有跡象顯示在內部動盪的時候，武裝部隊思量自身利益也許與政府相悖，而不願意支持政府。

本文使用兩個變數代表文武關係緊張，第一個變數爲政府失去武裝部隊支持，較符合上述的條件。此變數來自非暴力與暴力示威與其結果資料庫（The Nonviolent & Violent Campaigns & Outcomes, NAVCO2.0）的數據（Chenoweth & Lewis, 2013）。NAVCO 是學界研究社會運動與街頭抗爭的重要資料庫之一，記載具政治目的的群眾運動。[2] 不僅記錄抗爭者的行動，也紀錄抗爭對象（政府）的反應，而第一線與抗爭者對抗的通常是武裝部隊。此變數記錄 1945～2006 共 250 個抗爭事件中武裝部隊對政府的支持，操作定義爲政府麾下的武裝部隊轉移效忠對象，或是公開反抗政府號令，比如拒絕鎮壓街頭抗議。該變數觀察廣義的武裝部隊，包含軍隊與警察，主要考察高階軍官或警官對政府的行爲。這些行爲者原本是政府的前鋒，卻轉變態度拒絕對政府效忠。此變數爲二元變數，1 表示發生抗命或反叛。

對於潛在叛亂份子來說，政府失去武裝部隊支持是國家強制力弱化最直接的證據，也是掀起武裝叛亂最好的機會，由於 NAVCO 的資料記錄抗爭，也就是說政權受到挑戰，政治動盪不安，此時若部分高階軍官或警官選擇抗命或反叛，顯示武裝部隊決定依照自身利益而行動。武裝部隊與政府不站在同一陣線，失去武裝部隊支持的政府，無法有效鎮壓反抗者。潛在叛亂份子很容易取得這種公開資訊，並判斷政府鎮壓能力削弱，因此決定發動內戰試圖推翻政府或脫離中央。此變數不僅代表文武關係緊張，更能代表潛在叛亂份子對武裝部隊意向的瞭解。

第二個變數是過去 5 年內武裝部隊是否試圖推翻政府。此處採用 Powell 與 Thyne 的政變資料庫（Powell & Thyne, 2011），該變數記載成功與失敗的政變（coup attempt），此處僅使用失敗的政變，失敗政變代表政權沒有

[2] NAVCO 資料庫最新的版本爲 3.0，但是該版並不適合本文，2.0 版資料的觀察單位與本文資料庫相符合，而時間涵蓋範圍也較 3.0 來的長。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轉移，文武關係相當緊張，政府隨時擔心武裝部隊發動另一次政變。事實上 Powell 與 Thyne 的資料指出，政府在一年中可能不只發生一次政變，記錄最多可達 4 次。如果有一次政變成功，文武關係可能會在武裝部隊主導下趨於穩定，但是倘若政變成功後又發生一次失敗的政變，代表新政府仍舊無法有效控制武裝部隊，因此，本文使用的變數包含所有的失敗政變。政變也是叛亂份子最容易取得的公開資訊，失敗政變顯示軍隊和政府互不信任，代表有部分高階將領與政府領導人在爭奪政權，政府無法有效指揮武裝部隊。而政變產生的文武關係緊張往往持續一段時間，因此若 5 年內曾發生政變，都編碼爲 1，其餘爲 0，此變數的編碼至 2010 年。

以上兩個操作文武關係緊張的變數不存在直接相關，兩者在資料庫中也不相似，兩者的相關係數爲 0.123，卡方檢定呈現統計顯著（$p<0.001$）。

假設 2 認爲武裝部隊內部分裂會傳遞政府軍虛弱的信息，因此自變項應顯示武裝部隊內部組織有競爭關係。目前學界並沒有直接觀察武裝部隊內部不合的資料，由於武裝部隊的封閉性與指揮體系，潛在叛亂份子很難瞭解武裝部隊內部是否有分裂的狀況，但是當武裝部隊內部存在許多派系時，由於這些派系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就可能無法團結打擊武裝叛亂。派系數量越多，缺乏團結的機會就越大。

本文使用 Pilster 與 Böhmelt (2011; 2012; Böhmelt et al., 2017) 關於政變預防制度的資料。他們從過去的研究出發，[3] 提出軍事組織內部的相互平衡（counterbalancing）這個變數。此變數將相競爭的軍事組織以及它們的人員數量納入考量，計算的基礎爲國際戰略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關於各國實戰單位的資料。Pilster 與 Böhmelt 提出一項綜合指標，顯示政府設立多少相互競爭的軍事組織，這些組織通常是軍種內部的特殊機關、情報單位、或新設立的專門部隊，政府利用避免軍事領導人握有大權，預防軍隊干預或威脅政府，此變數在政變預防的文獻中被廣泛使用，是瞭解武裝部隊內部競爭關係的重要資料來源。由於計算的

[3] 早期的研究請參見 Belkin 及 Schofer (2005)；Quinlivan (1999)。DeBruin (2017) 進一步改善此變數的操作性意涵，提出相互制衡的軍事力量（counterweight forces）的概念。但是該資料庫僅包含隨機選出的 65 個發展中國家，因此不適用於本研究。

臺灣大學政治學資料庫

基礎是各組織的人員數量百分比，因此該變數代表政府建立組織的努力程度，而非組織個數，在本資料庫中的資料值範圍從 0～5.41。[4] 該資料從 1970 開始至 2017。此變數設定 1 年的延遲（lag），因爲政府建立軍事組織，需要一段時間培養組織勢力，才能達到互相制衡的效果，組織間相互競爭需要一些時間；而潛在叛亂份子也需要時間去瞭解武裝部隊內部是否存在競爭關係。因此相互平衡的軍事組織要影響內戰爆發，必須透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驗證，如果內部競爭相當激烈，潛在叛亂份子就更有信心發動內戰。

三、控制項

控制變數包含數個常見的內戰爆發因素，亦包括一般學界衡量國家武力的變項。其中，軍事人員總數與人口總數出自 Correlate of War (COW) 資料庫（Singer et al., 1972: v4.0），此二數據能代表國家動員武裝部隊的力量，也是最容易爲潛在叛亂份子觀察的資訊，強大的強制性武力通常代表政府嚇阻叛亂的能力，但是如前文討論的，軍事人員數量並不完全代表政府可用的武力。而人口數量可代表許多不同的影響內戰的變數，包括經濟規模、人力資源等等。第三個控制變數爲軍事政權，這類政權擁有較特別的文武關係，由於政府由高階將領組成，對於武裝部隊的控制理應較強，但是在軍事政權中，政府與武裝部隊仍可能處於緊張狀態，武裝部隊內部其他將領可能與政府領導人有紛爭與嫌隙，因而不聽政府號令或是試圖推翻政府。此變數來自 Geddes, Wright 與 Frantz (Geddes et al., 2014) 的政體資料庫。

第四個變數爲民主政體，民主國家的內戰發生率與非民主國家有所不同，民主國家的政治透明度，亦有助於潛在叛亂份子瞭解國家武力的眞實資訊，因此模型控制一國是否爲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的資訊來自 Polity IV（Marshall et al., 2002），在 −10～10 的民主化程度中達到 7 以上，編碼爲民主國家。另外前述的軍事政權與民主國家並非互斥的一體兩面。資料庫中即有 16 個國家在特定年份同時是民主國家又是軍事政權，顯見此二變數代表不同的概念。

[4] 關於本變數計算的公式請參見 Pilster 及 Böhmelt (2015: 168)。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控制項另外囊括數個代表政府經濟實力的變數，其中，人均國民生產毛額是由兩個資料庫互補組成，資料來自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與賓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Feenstra et al., 2013；The World Bank, 2010）。[5] 由於國民生產毛額資料時有缺漏，此數據爲目前能取得最完整的經濟數據。最後三個控制項爲自然資源租金、外債總額、與稅收佔 GDP 百分比，資料皆來自世界發展指標。此三變數都代表國家能使用的財政資源，自然資源租金較爲特別，它一方面代表國家增加強制力的能力，另一方面卻又作爲衝突的根本原因。目前學界已相當確定石油是導致衝突的主因（Ross, 2015），資源收入導致的政府治理敗壞，更是令國內衝突升級的間接原因（張文揚、平思寧，2017；Cuvelier et al., 2014；Leite & Weidmann, 2002；Venables, 2016）。稅收和外債總額代表一個國家的財政能力，在入不敷出、外債高築之際，政府無法有效治理國家而使的不滿政府者掀起武裝叛亂。在此情況下，政府不僅無力組織有戰鬥力的武裝部隊，甚至無法滿足武裝部隊的支出需求，使的武裝部隊解散或拒絕效忠政府。

表 1　敘述統計表

變　　項	觀察值數量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內戰爆發	9,620	0.038	0.191	0	1
失去武裝部隊支持	9,620	0.025	0.155	0	1
五年內失敗政變	8,926	0.090	0.286	0	1
競爭軍事組織程度$_{(t-1)}$	7,204	1.487	0.794	0	5.411
武裝部隊人員數（千）	9,477	136.335	448.615	0	5800
總人口數（千）	8,282	31054.87	106934.7	109	1324655
軍事政權	9,620	0.060	0.238	0	1
民主國家	9,620	0.369	0.482	0	1
log 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9,527	6.675	3.140	0	11.364
自然資源租金	9,527	6.699	12.497	0	89.220
外債總額	9,527	7.38e+09	3.22e+10	0	8.74e+11
稅收佔 GDP 百分比	9,527	3.440	7.6	0	65.903

資料來源：作者依本文使用之資料庫製表

[5] 此資料庫目前由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與荷蘭的格羅寧根大學維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族群數目與崎嶇的地形對內戰爆發有顯著影響，前者增加人民積怨的機率，後者則代表叛亂份子阻抗政府鎮壓的能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爲 Fearon 與 Laitin (2003) 的研究，由於其資料庫的時間僅記錄到 2001 年，若模型包含此二變數，將會犧牲三分之一的觀察值，因此本文未將此二變數加入，但若放入模型中作爲控制變項，仍不影響統計結果。所有變項的敘述統計列於表 1。

四、統計模型

量化分析使用廣義線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s），本文依變項衡量新一輪內戰爆發與否，爲二元資料，不適合線性模型，因此使用勝算對數回歸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由於本資料爲跨國跨時，故採用以下學界常用的方法估計時間序列縱橫資料，避免組間以及時間自相關性產生的問題。所有模型採用隨機效果（random effect）控制國家異質性，雖然固定效果（fixed effect）模型也是一種方法，但該模型著重考慮國家內的變異，依照本文的假設，個別國家的特性並非影響依變數的主因，使用隨機效應控制較爲妥當（Bell & Jones, 2015），另外，使用固定效應將使觀察值減少至 5,000 個左右，犧牲許多可用的資料。依照 Carter 與 Signorino (2010) 的建議，採用內戰未爆發的持續時間 (t, t^2, t^3) 來控制時間自相關性（autocorrelation）的影響。模型均回報以國家作爲集群單位（cluster）校正過的健全標準誤。模型 1-3 各包含一個自變項與控制項，最後一個模型包含所有變數。完整模型如下，其中 Y 爲內戰爆發與否，$\varepsilon_{i,t}$ 包含組內與組間的誤差。

$$P_r\left(Y_{i,t} \neq 0 \,\middle|\, X_{i,t}\right) = \frac{e^{X_{i,t}\beta}}{1+e^{X_{i,t}\beta}}$$

$$X_{i,t}\beta = \beta_0 + \beta_1(\text{文武關係}_{i,t}) + \beta_2(\text{內部分裂}_{i,t-1}) + \beta_3(\text{控制項}_{i,t}) + \varepsilon_{i,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統計結果與案例討論

一、統計結果

表 2 顯示統計結果，包含 4 個模型，前兩個模型驗證假設 1，第三個模型驗證假設 2，最後一個完整模型包括所有自變項。

表 2　國家武裝部隊實力對內戰發生之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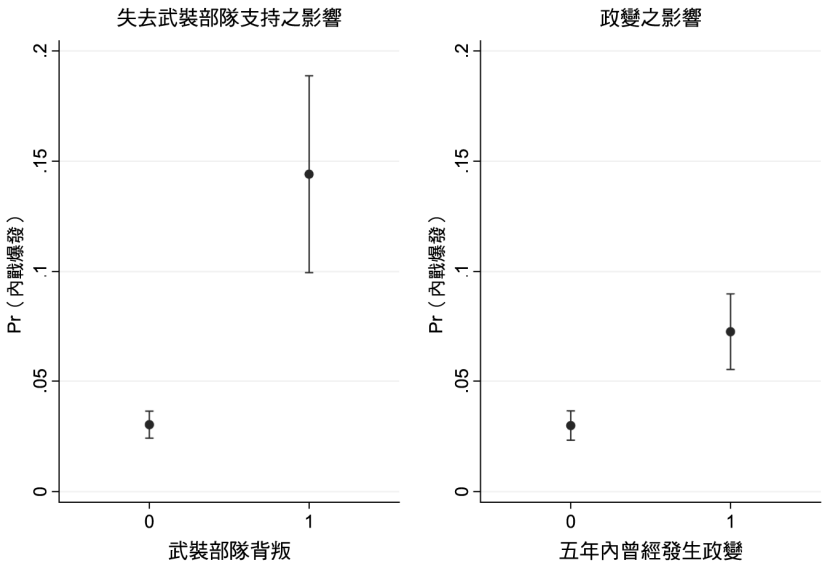
	(1) 武裝部隊背叛	(2) 失敗政變	(3) 軍隊內組織	(4) 完　整
失去武裝部隊支持	1.811***			1.680***
	(0.231)			(0.294)
五年內失敗政變		0.990***		0.857***
		(0.167)		(0.238)
競爭軍事組織程度$_{(t-1)}$			0.300**	0.236*
			(0.103)	(0.118)
武裝部隊人員數	0.0000608	0.000122	-0.0000432	-0.0000259
	(0.000228)	(0.000265)	(0.000164)	(0.000189)
總人口數	0.00000171	0.00000159	0.00000156	0.00000172
	(0.00000163)	(0.00000172)	(0.00000114)	(0.00000126)
軍事政權	-0.106	-0.0765	-0.0243	-0.460
	(0.251)	(0.275)	(0.335)	(0.382)
民主國家	-0.495*	-0.431	-0.523*	-0.460
	(0.223)	(0.225)	(0.245)	(0.247)
log 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0.0395	-0.0541	-0.125**	-0.115*
	(0.0294)	(0.0293)	(0.0467)	(0.0558)
自然資源租金	0.0138**	0.0145**	0.0113*	0.0142**
	(0.00472)	(0.00470)	(0.00478)	(0.00526)
外債總額	1.87e-12	3.11e-12	3.21e-12	3.16e-12
	(3.55e-12)	(3.54e-12)	(2.62e-12)	(3.06e-12)
稅收佔 GDP 百分比	0.0224**	0.0221**	0.0163	0.0186*
	(0.00846)	(0.00828)	(0.00867)	(0.00940)
常數	-3.022***	-3.111***	-2.527***	-3.027***
	(0.220)	(0.235)	(0.425)	(0.558)
觀察值數量	8,189	8,189	5,719	5,719

括弧內為健全標準誤，表格省略時間序列控制變項。*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作者依本文使用之資料庫製表

模型 1、2 的自變項代表政府與武裝部隊的緊張關係，即便用不同的操作變項，結果顯示緊張的文武關係會升高內戰發生的機率，結果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在完整模型中這些變數同樣達到統計顯著。這顯示文武關係緊張的確使內戰更容易爆發。因此假設 1 得到證實。圖 1 顯示兩個自變項的機率預測以及其 95% 信心水準區間。可看出兩者對內戰爆發都有正面影響。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　文武關係對內戰爆發之影響預測



資料來源：作者依表 2 模型 1 及模型 2 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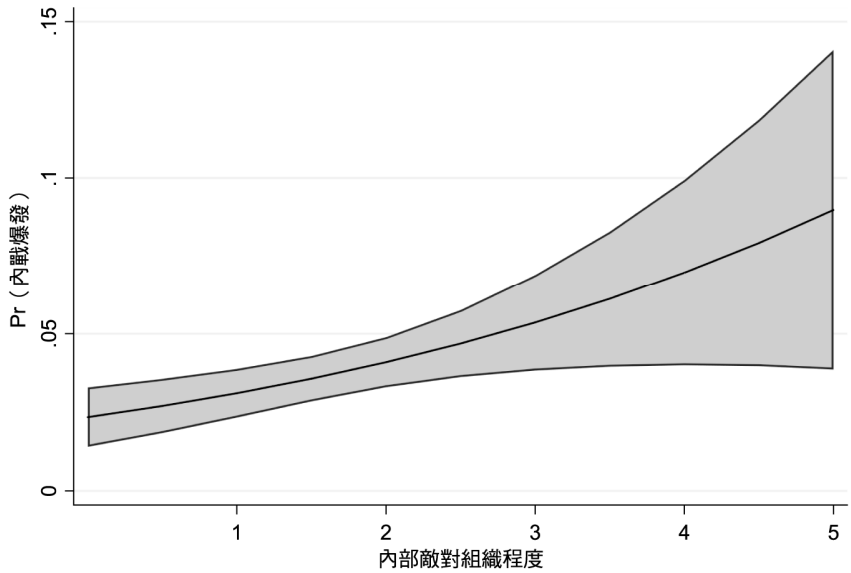
詳細瞭解自變項的效果，在其他狀況不變下，武裝部隊曾經有背叛行爲的國家內戰發生機率爲 14%，仍獲得武裝部隊支持的國家爆發內戰的機率爲 3%。差距 4 倍有餘，這顯示失去武裝部隊支持是一項公開的警訊，潛在叛亂份子明顯可觀察到國家鎮壓力量不足，發動內戰的意願強烈。

再看另一項自變數，過去 5 年不曾發生政變的國家，其內戰發生機率約爲 3%。倘若 5 年內曾發生失敗政變，機率上升至 7%，約爲兩倍。將此變數改爲當年發生失敗政變，統計結果仍然顯著。政變失敗與前項變數同樣是公開資訊，潛在叛亂份子容易觀察。政變失敗固然代表政府能鎮壓有異心的軍事領導人，但也讓潛在叛亂份子確定武裝部隊與政府關係並不融洽，他們可推測政府必須將心力放在整頓武裝部隊內部，無力整合武力鎮壓叛亂，因此趁此機會發動內戰。

假設 2 指出武裝部隊內部分裂與內戰爆發相關。武裝部隊內的競爭組織程度在模型 3 與模型 4 都呈現統計顯著，此二模型僅包括 1970 年以後的資料，因此觀察值較少。競爭程度越高則越容易爆發內戰。因此假設 2 成立，其效果以及信心水準區間顯示於圖 2。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圖 2　武裝部隊內部分裂對內戰爆發之影響預測



資料來源：作者依表 2 模型 3 製圖

武裝部隊內各個組織爭功諉過並非秘密資訊，政府成立不同軍事組織的目的就在於相互制衡，潛在叛亂份子能輕易掌握組織間的競爭關係。競爭越激烈，代表各組織坐擁山頭的情況越強烈，而政府協調這些組織共同合作的難度就增高。模型 3 的預測顯示，組織程度爲 1 時內戰爆發機率約爲 3%，可視爲模型的基礎預測，因爲這代表武裝部隊沒有分裂傾向。程度爲 2 時將增加 1% 的內戰爆發機率。而對立的軍事組織程度從 1 增加爲 4 時，內戰爆發機率將翻倍，將近 6%。這顯示政府的制衡策略往往產生副作用，增加內部對立，這些組織相互競爭資源，或推諉卸責，使潛在叛亂份子有機可趁而發動內戰。

在控制項中，武裝部隊人數與總人口數影響雖爲正向，但不具統計意義，這些變項取自然對數以保持平均分布後，假設 2 的變項無法達到統計顯著。[6] 是否爲軍事政權不影響內戰爆發，但是民主政體確實對內戰爆發有負面影響。呼應過去研究，此結果在模型 2 與 4 中未達統計水準。同樣的，

6　關於本統計結果以及其他的附加分析，請見附錄。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均生產毛額也只在模型 3 與 4 達到統計水準，初步證實富裕國家較不容易發生內戰。

在所有模型中均達統計顯著的變項爲自然資源租金，支持平思寧（2015）的發現，自然資源的存在是引發內戰的誘因，租金收入越豐富，內戰爆發的機率也就越高。外債總額未達統計顯著水準，無法確認其關係。但是稅收佔 GDP 百分比在 3 個模型中都呈現統計顯著，其影響是正面的。這也許是因爲稅收充裕的政府（稅收可能來自自然資源租金）容易成爲叛亂份子覬覦的目標，另外，特定地區可能爲中央政府貢獻龐大稅收，該地區人民心生不滿而藉由武裝叛亂脫離中央掌控，60 年代沖伯（Moïse Tshombe）在加丹加（Katanga）宣布武裝獨立即屬此類。另一方面，這也顯示稅收無法幫助政府預防內亂發生，很大原因在於政府不見得能有效地將稅收轉爲武力，用稅收聘僱傭兵作戰即爲很好的例子，傭兵雖然可快速建立戰鬥力，但是他們的忠誠與可靠性卻比不上國家訓練的正規武裝部隊。另外，政府也可能選擇不將稅收投入在建立武力上，也不見得會用於改善公共建設與經濟發展，因此無法阻止內戰爆發。

二、案例討論：馬利

以下由兩個歷史案例，說明本文理論的運作機制，分別爲馬利與衣索比亞。案例選擇以符合本文立論爲條件。以下討論並非試圖驗證假設，而是以資料庫中的實例說明，在符合本文假設的情形下，潛在叛亂份子會認識到政府的鎮壓能力不足，在兩個案例中的叛軍，均認識到由於經濟情勢不佳或政治紛擾，政府無法吸引武裝部隊對其效忠。政府也的確試圖贏得武裝部隊的支持，無奈始終無法確保武裝部隊的忠誠。政府的虛弱爲武裝反叛建立良好的條件，成爲叛軍發動武裝衝突的重要考量之一。

馬利的文武關係在特拉奧雷（Moussa Traoré）長達 30 餘年的獨裁統治下相當穩定，馬利武裝部隊的內部組織數量在此期間相當單純，1985 年後開始在 3.2～4.4 間浮動，這段時期一直到 2014 年爲止，是馬利內部最脆弱、內戰頻仍的時期。馬利在 90 年代初期發生由北方圖阿雷格（Tuareg）叛軍反抗政府統治的內戰。這也是馬利政府建立民主政府，開始試圖以文人領軍的時候。馬利獨立後曾發生數次軍事政變，1991 年高階將領發動政變推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翻特拉奧雷，成立過渡政府，隔年開始推動民主化，民主化政府爲控制武裝部隊，持續利用不同組織平衡武裝部隊勢力，NAVCO 資料顯示 1990、1991、1994 都曾發生武裝部隊抗命，這段期間政府軍一直與叛軍有戰鬥，前線部隊與中央政府彼此互不信任，使得北方叛軍擁有足夠信心繼續武裝對抗。

1992 年政府與叛軍組織協議停火，大部分叛軍融入政府軍中，但是叛軍的升遷與職責都受到限制，因此政府軍內部很快就出現不合，一部分武裝部隊脫離原組織，再度成爲叛軍繼續反抗中央政府，分離的叛軍雖然力量不大，但他們知道中央無力鎮壓，政府軍持續與部分叛軍發生零星戰鬥，始終無法結束內戰。

主和的叛軍於 1995 年與政府簽訂和平協議，許多對協議不滿的叛軍投奔利比亞，成爲利比亞軍隊的中堅份子。2011 阿拉伯之春導致格達費垮台，這些專業軍人回到馬利，馬利正面臨經濟衰退與蓋達組織（AQIM, National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zawad）的威脅。中央政府無法有效掌控馬利北方，只能藉由當地的政治與軍事精英合作維持名義上的統治。歸國的前叛軍與殘餘的馬利北方叛軍勢力重組了武裝力量 MNLA (National Moveme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Azawad)。並對政府發出同意自治的通牒，隨後在 2012 年初發動武裝叛變。一如叛軍所預期的，政府軍鎮壓能力不足，內部意見分歧，無法有效統一資源與戰力，初期交鋒政府軍即以慘敗收場。政府的武裝部隊在裝備不足下投入前線，因而將戰敗的憤怒指向政府，發動政變推翻總統竇瑞（Amadou Toumani Touré），竇瑞被趕下台後，又集結效忠自己的部隊，發動了一次失敗的政變。在軍隊分裂各爲其主這段時間，新的政府始終無法有效對北方展開反攻。MNLA 在北方建立獨立政府。而後該政府又經歷分裂與重組，新組織 CMA (Coordination of Azawad Movements) 於 2014 年在阿爾及利亞的介入下與政府停火議和。[7]

馬利自冷戰後發生的內戰同時符合假設 1 與假設 2 的條件。文武關係

---

[7] 有關馬利這段歷史，請參考 UCDP 的衝突敘述（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N.d.）。另外可參考 Center for Advanced Defense Studies 於 2013 年出版的報告（Wulf & Mesko, 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緊張與武裝部隊分裂影響了國家指揮武裝部隊的能力，也造成武裝部隊鎮壓能力低落，北方分離主義勢力即使被打敗，仍伺機尋求武裝獨立，只要政府軍隊無法團結，北方叛軍就會開始尋求脫離中央統治。馬利至今仍爲完全擺脫叛軍的威脅，叛軍殘黨部分與國際恐怖組織合流，國家始終未能有效統治北方。

三、案例討論：衣索比亞

衣索比亞的武裝部隊組織數量自 1970 年起在 1～2.4 之間浮動，因此內戰與內部派系鬥爭的關係較淺，衣索比亞案例顯示文武關係對內戰爆發的影響，當政府無法滿足武裝部隊利益時，武裝部隊決定不再支持政府，甚至對政府發動政變，而分離主義份子趁著國家鎮壓能力衰弱，宣布武裝反抗，同時國內政黨開始武裝化，爲爭奪政權展開武裝叛亂，內戰波及全國 16 年之久。

衣索比亞向來爲君主專政，國王 Haile Sellasie 藉由拔擢忠心的資深軍官來控制武裝部隊。[8] 但是 1960 年末，一批對衣索比亞經濟現狀不滿的年輕軍官發動政變，政變雖然在皇家衛隊和軍隊反對下宣告失敗，但國內開始出現許多挑戰王權的聲音（Adejumobi, 2007: chap. 5）。在非洲國家獨立的浪潮下，厄利垂亞分離主義份子開始採取反抗行動，解放運動成員原本預計發動武裝政變推翻 Sellasie，但更爲激進的厄利垂亞解放陣線 Eritrean Liberation Front (ELF) 在 1961 年發動武裝獨立戰爭（Iyob, 1997），Sellasie 不得不將大量軍隊轉移到厄利垂亞應付游擊戰。

1970 年代初衣索比亞經濟情況進一步惡化，乾旱帶來的飢荒、失敗的土地改革、錯誤的經濟政策、以及石油危機，使物價飛漲，人民對王權失去信心，知識份子與職業團體走上街頭。受到物價影響，軍隊的飲食與環境惡劣，低階士兵對政府產生強烈不滿，1974 年初，由於不滿生活品質低劣，南方城鎮 Negele 的駐軍譁變，挾持了他們的指揮官，消息傳出後，各

8 衣索比亞的資深軍官和年輕軍官的差異不僅在於階級，他們也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享有不同的社會地位，此現象無法顯示在本文的內部組織數量變項中。這樣的隔閡與專制王權下的社會階層有關，導致資深與年輕軍官對於王權的支持出現分歧，請參見 Abate (1984: 382-384) 的敘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都發生叛變，連駐紮於厄利垂亞 Asmara 的軍隊也出現譁變，士兵們要求更高的工資與待遇。儘管 Sellasie 宣布調漲軍人薪資 37%，承諾改善生活條件，仍然無法滿足青年軍官的要求。國王失去武裝部隊支持，各地駐軍譁變之際，首都的武裝部隊與社會各界團體站在一起反抗王權，1974 年 2 月，Sellasie 在大規模群眾運動與軍隊譁變中被罷黜，一批中低階軍官成立臨時軍政府（the Armed Forces Coordinating Committee, Derg）。Derg 終結王權，殺害政府官員、貴族、與支持王權的地主階級，Mengistu Haile Mariam 逐漸剷除軍隊內政敵，取得領導地位（Abate, 1984）。

1974 年革命後，中央對各地區的統治開始鬆動，NAVCO 資料顯示 1974、1975、1977，以及整個 1980 年代都有政府失去武裝部隊支持的紀錄，原因在於各地政府軍加入叛軍或是脫離中央政府管轄。在北方，一批資深軍官與前貴族組成衣索比亞民主聯盟（Ethiopia Democratic Union, EDU），反對 Derg 的統治。除戰火綿延的厄利垂亞地區外，提格雷（Tigray）地區的分離主義份子也發動武裝革命，主要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TPLF）領導。[9] 同時間，索馬利亞暗助歐加登（Ogaden）地區的分離主義份子，成立西索馬利亞解放陣線（Western Somali Liberation Front, WSLF），展開游擊戰反抗中央統治（Laitin, 1979）。

首都的政治情勢並不穩定，Derg 由於軍事獨裁與激烈的土地改革受到社會各界團體的撻伐。學生、工人團體與農民組成衣索比亞人民革命黨（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 EPRP），要求政權轉移至文人政府，Mengistu 掌權後開始強力鎮壓 EPRP 以及 TPLF，同時還疲於應付厄利垂亞獨立戰爭。[10] 厄利垂亞叛軍在 1977 年攻下境內多數大城，索馬利亞趁虛派兵入侵，Mengistu 依靠蘇聯援助才打敗索馬利亞與 WSLF。衣索比亞內戰就在內憂外患中持續，直到 1991 年各路叛軍組成聯軍攻破首都，Mengistu 流亡辛巴威才告結束。

Sellasie 的下台顯示軍隊的支持以及內部團結的重要性。加入群眾抗議

9　由於地緣相鄰，TPLF 與 ELF 曾合作抵抗 Derg 的軍事鎮壓與搜捕，請參見 Young (1996)。

10　有關 Derg, EPRP, TPLF 的政治合作與衝突請見 UCDP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N.d.)的衝突敘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反對王權的主要是年輕軍官，有許多皇家衛隊的軍官仍希望維持國王的地位，但是 Derg 上台之後，有計畫地清洗王室與貴族，使 Sellasie 孤立無援，皇家衛隊成員也四散。首都動蕩不安，使北方與東方的叛亂份子得以實質脫離中央管轄，內憂外患使衣索比亞的內戰綿延不斷，厄利垂亞最終於 1993 年獨立，一直到 2018 年衣索比亞才與厄利垂亞建立外交關係。

柒、結論

本文試圖從政府的角度瞭解內戰發生的原因，將討論集中在國家的武力鎮壓能力，而非社會治理能力。因爲對於潛在叛亂份子來說，國家對於經濟民生或參政權的改革並不總是可靠，也可能無法延續，經濟、就業、勞動條件可能隨著景氣循環而變差，政府承諾的政治參與亦可能不會兌現。這些不滿政府的人士因而有推翻或取代政府的意願，但是在國家的強制性武力下，只能選擇與政府交涉、參與政治、或是在國外進行反政府活動。但是國家並非總是有能力鎮壓叛亂，60 年代以來新興國家的內戰顯示，許多國家沒有能力延伸治權，而潛在叛亂份子往往會趁國家的鎮壓能力不足時掀起叛亂。

本文指出武裝部隊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可作爲一種公開資訊，讓潛在叛亂份子瞭解政府鎮壓叛亂的能力。這些資訊可分爲兩類，一類爲直接觀察武裝部隊對政府效忠的程度。在本研究中以武裝部隊抗命以及過去政變紀錄來代表。兩者都是可觀察的公開資訊。另一類爲武裝部隊內部是否能合作鎮壓叛亂，以武裝部隊內部競爭組織的程度做爲代表。雖然內部競爭過程並非公開透明，但當這些競爭白熱化，影響軍官升遷、人員裝備配給、駐紮等資訊時，潛在叛亂份子可推測武裝部隊難以團結。基於這幾項變數，本研究採用量化分析驗證兩項假設，結果顯示兩種資訊都可能增加內戰爆發的機率。

武裝起義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潛在叛亂份子會尋求最好的時機，在國家武力疲弱的時候掀起武裝叛亂。這尤其適用於分離主義勢力。當武裝部隊不聽政府號令或戰鬥意願低落時，分離主義份子反抗中央統治的成功率就會大增，發動武裝叛亂的意願就越高。本文結果顯示，政府避免內戰的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首要之務是建立有效的鎮壓能力。一支忠誠且有威攝武力的武裝部隊，是政府嚇阻判亂的要件，其次，武裝部隊不僅要強大，還必須保持內部團結。處於政變威脅的政府往往採用分而治之的手段，並著重培養一批完全忠誠的近衛部隊，雖然這減少政變的可能，但同時也削弱政府應變叛亂的能力。武裝部隊內部若派系林立，高階將領彼此競爭資源或是爭奪功勞，都會使政府鎮壓叛變的能力削弱。觀察到此現象的潛在叛亂份子於是更有意願掀起叛亂。

本文提出的兩個假設不能視爲決定內戰爆發的唯二因素，且與學界目前對於內戰爆發的瞭解不相衝突。武裝叛亂必然具有一些結構性的條件，貧富不均、族群矛盾、區域間發展差異、宗教衝突等等，仍舊是人民萌生脫離或推翻現有政權的根本因素。幾乎每個國家都有對政府不滿的人士，但並非所有對政府不滿的人士都會組織武裝叛亂。除了程度大小的問題外，還有動員以及資金來源的困難。外來的援助、政治體制的差異，都會影響內戰爆發的機率。這些學界普遍接受的內戰爆發解釋，通常比本文使用的變項有更高的實質顯著性（substantive significance），如果沒有這些促使反政府人民提起武器的遠因，國家武力是否有效就不這麼重要。

本文聚焦於政府來檢視內戰爆發，除文武關係與內部團結之外，仍有許多政府能影響內戰爆發的因素，比如政府對特定民族的歧視政策、軍隊國家化的程度、軍隊族群與宗教的組成是否有利政府控制等等。有待未來更進一步探究。另外，統計模型的結果受可用的數據所限，不見得能直接代表理論中使用的概念，在假設二的情況尤其如此。本文討論兩個實際案例，即希望能以歷史說明理論機制，顯示在武裝部隊的忠誠與團結有疑慮的狀況下，潛在叛亂份子會抓住這個政治機遇。這個討論方向有助於吾人瞭解內戰爆發的近因，馬利與索馬利亞的案例都有分離主義者趁中央虛弱，無力鎮壓時宣布獨立的例子。分離主義的呼聲在這些地方由來已久，但是長年受到中央以武力恫嚇。但是當國家武力虛弱或分裂時，國家能嚇阻潛在叛亂份子的能力極爲有限。民主過渡時期的馬利政府無暇鎮壓北方的叛亂，而 Sellasie 即便做了許多努力，許下許多承諾，仍然挽不回年輕軍人的效忠，只能看著國家走向分崩離析。

在政府、武裝部隊、以及潛在叛亂份子三方的關係中，能對內戰爆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決定性影響的是潛在叛亂份子這一方。政府與武裝部隊之間的資訊落差極小，但潛在叛亂份子與其他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資訊落差。潛在叛亂份子所接收的資訊，以及他們的領導人對於情勢研判是否正確，是他們是否發動內戰的關鍵。對於政府而言，如何隱藏與武裝部隊的矛盾，或是製造政府軍強大不可侵犯的形象，是預防叛亂的重點。這意味著政府不見得需要維持強大的武裝部隊，只需要讓反政府人士認爲政府有意願也有能力鎮壓武裝叛亂。如果政府能掩飾其強制力不足，避免衰弱的印象公開，那麼同樣能維持對社會控制。這能夠解釋爲何政府通常非常注重軍力宣傳，以及傾向在可能叛亂的地區實施更頻繁的駐軍與嚴格的資訊管制。

國家可嚇阻、預防內亂的方法不僅限於國家武力，國家可透過政治協商、擴大自治權、財富重分配、維持經濟發展等，減少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使潛在叛亂份子無法號召群眾武裝叛變，這些方式無法在本文一一討論。但本文認爲，培養能有效鎮壓叛亂的武力，仍然是政府對付反政府人士最普遍、最常見的方式。本文結果凸顯了政府的強制力在內戰爆發中扮演的角色。內戰發生不能僅由武裝部隊的質或量來衡量。如同軍隊的數量不能代表其素質或制敵戰略，國家擁有的強制力也有可能僅是金玉其外，在衝突發生時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鎮壓能力是否能有效發揮，是潛在叛亂份子在發動內戰前的主要考量。潛在叛亂份子要發動武裝叛亂，除需確保人力物力之外，會進一步瞭解武裝部隊是否對政府效忠、內部是否團結，由此可見，要預防內戰爆發，除了讓政府與反政府人士協商排解爭議之外，必須讓他們瞭解發動衝突的代價不菲，降低他們發動戰爭的意願。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平思寧，2015，〈自然資源與國內衝突：權力轉移理論的應用〉，《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3): 471-506。Ping, Szu-ning. 2015. “Ziran ziyuan yu guonei chongtu: quan i zhuanyi lilun de yingyo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Civil Conflict: An Application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Philosophy* 27(3): 471-506.

張文揚、平思寧，2017，〈自然資源也詛咒了環境表現嗎？一個跨國實證的分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析〉，《台灣政治學刊》，21(2): 181-234。Chang, Wen-yang & Szu-ning Ping. 2017. “Ziran ziyuan ye zuzhou le huanjing biaoxian ma? yige kuaguo shizheng de fenxi” [Do Natural Resources also Curs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Cross-Country Analysis].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2): 181-234.

林佾靜，2014，〈敘利亞內戰問題之啓示：一個失敗國家的形成與外溢危機〉，《長庚人文社會學報》，7(2): 359-418。Lin, Yi-ching. 2014. “Xuliya neizhan wenti zhi qishi: yige shibai guojia de xingcheng yu waiyi weiji” [Reflection on Syrian Civil War: The Formation of One Failed State and the Spillover Crisis]. *Chang Gung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7(2): 359-418.

二、西文部分

Abate, Y. 1984.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Ethiopia.” *Armed Forces & Society* 10(3): 380-400.

Adejumobi, S. A. 2007. *The History of Ethiopia*.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Bates, R. H. 2008. *When Things Fell Apart: State Failure in Late-Century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lkin, A. & E. Schofer. 2005. “Coup Risk, Counter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Security Studies* 14(1): 140-177.

Bell, A. & K. Jones. 2015. “Explaining Fixed Effects: Random Effects Modeling of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and Panel Data.”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3 (January): 133-153.

Bennett, D. S., P. Poast, & A. C. Stam. 2017. “NewGene: A Conceptual Manual.” in https://papers.ssrn.com/abstract=2596297. Latest update 16 September 2019.

Biddle, S. & S. Long. 2004. “Democracy and Military Effectiveness: A Deeper Look.”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8(4): 525-546.

Böhmelt, T., A. Ruggeri, & U. Pilster. 2017. “Counterbalancing, Spatial Dependence, and Peer Group Effects.”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5(2): 221-239.

Brown, C. S., C. J. Fariss, & R. B. McMahon. 2016. “Recouping after Coup-Proofing: Compromised Military Effectiveness and Strategic Substitutio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2(1): 1-30.

Bruneau, T. C. & F. C. (CRIS) Matei. 2008. “Towards a New Conceptualization of Democratization and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Democratization* 15(5): 909-9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uhaug, H. 2010. “Dude, Where’s My Conflic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7(2): 107-128.

Carter, D. B. & C. S. Signorino. 2010. “Back to the Future: Modeling Time Dependence in Binary Data.” *Political Analysis* 18(3): 271-292.

Cederman, Lars-Erik, K. S. Gleditsch, & H. Buhaug. 2013. *Inequality, Grievances, and Civil War*. 1st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ederman, Lars-Erik, N. B. Weidmann, & K. S. Gleditsch. 2011.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Ethnonationalist Civil War: A Global Compari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03): 478-495.

Chenoweth, E. & O. A Lewis. 2013. “Unpacking Nonviolent Campaigns: Introducing the NAVCO 2.0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0(3): 415-423.

Clayton, G. 2013. “Relative Rebel Strength and the Onset and Outcome of Civil War Medi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0(5): 609-622.

Collier, P. & A. Hoeffler. 2002. “On the Incidence of Civil War in Africa.”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6(1): 13-28.

Collier, P. & A. Hoeffler. 2004. “Greed and Grievance in Civil War.”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6(4): 563-595.

Collier, P. 2000. “Rebellion as a Quasi-Criminal Activ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4(6): 839-853.

Cunningham, D. E., K. S. Gleditsch, & I. Salehyan. 2009. “It Takes Two.”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3(4): 570-597.

Cuvelier, J., K. Vlassenroot, & N. Olin. 2014. “Resources, Conflict and Governance: A Critical Review.” *The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Society* 1(2): 340-350.

DeBruin, E. 2017. “Preventing Coups d’état: How Counterbalancing Work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2(7): 1433-1458.

DeRouen Jr. K. R. & D. Sobek. 2004. “The Dynamics of Civil War Duration and Outcom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1(3): 303-320.

DeSoysa, I. & H. Fjelde. 2010. “Is the Hidden Hand an Iron Fist? Capitalism and Civil Peace, 1970-2005.”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7(3): 287-298.

Derouen, K., J. Lea, & P. Wallensteen. 2009. “The Duration of Civil War Peace Agreement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6(4): 367-387.

Desch, M. C. 2001.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The Chang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Maryland: JHU Press.

Fearon, J. D. & D. D. Laitin. 2003.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7(1): 75-90.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Feaver, P. D. 1999.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211-241.

Feenstra, R. C., R. Inklaar, & M. Timmer. 2013.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 (NBER Working Paper No.19255).” in https://cid.econ.ucdavis.edu/Papers/Feenstra_Inklaar_Timmer_NBER_wp19255.pdf. Latest update 16 September 2019.

Geddes, B., J. Wright, & E. Frantz. 2014. “Autocratic Breakdown and Regime Transitions: A New Data Se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2): 313-331.

Gleditsch, K. & A. Ruggeri. 2010.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Democracy, and Civil War.”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7(3): 299-310.

Gleditsch, N. P., P. Wallensteen, M. Eriksson, M. Sollenberg, & H. Strand. 2002. “Armed Conflict 1946-2001: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9(5): 615-637.

Gurr, T. R. 2015. *Political Rebellion: Causes, Outcomes and Alternatives*. 1st ed.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Huntington, S. P. 1957.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 P. 2006.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uth, P. & J. Aronson. 2017. “The Size of Rebel and State Armed Forces in Internal Conflicts: Measurements and Implications.” In *Peace and Conflict 2017*, eds. David Backer & Ravinder Bhavnani. New York: Routledge, 101-141.

Iyob, R. 1997. *The Eritrean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Domination, Resistance, Nationalism, 1941-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nowitz, M. 2017.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A Social and Political Portrai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Jenkins, J. C. 1983.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527-553.

Lacina, B. 2006. “Explaining the Severity of Civil War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0(2): 276-289.

Laitin, D. D. 1979. “The War in the Ogaden: Implications for Siyaad’s Rôle in Somali Histo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7(1): 95-115.

Lawrence, C. 2015. *America’s Modern Wars: Understanding Iraq, Afghanistan and Vietnam*. Philadelphia, PA: Casemate.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料庫

Leite, C. & J. Weidmann. 2002. “Does Mother Nature Corrupt? Natural Resources,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Governance, Corrup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ds. George T. Abed & Sanjeev Gupta.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59-196.

Londregan, J. B. & K. T. Poole. 1990. “Poverty, the Coup Trap, and the Seizure of Executive Power.” *World Politics* 42(02): 151-183.

Malešević, S. 2010. *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shall, M., K. Jaggers, & T. R. Gurr. 2002.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02. Version P4v2002e.” in 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Latest update 16 September 2019.

McAdam, D. 1999.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2nd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Carthy, J. D. & M.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6): 1212-1241.

Moore, B. 1993.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1st ed. Boston: Beacon Press.

Olson, M. 1971.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Second Printing with New Preface and Appendix*. Revised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ttersson, T., Stina H., & M. Öberg. 2019. “Organized Violence, 1989-2018 and Peace Agreement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6(4): 589-603.

Pilster, U. & T. Böhmelt. 2011. “Coup-Proofing and Military Effectiveness in Interstate Wars, 1967-1999.”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8(4): 331-350.

Pilster, U. & T. Böhmelt. 2015.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Coup- Proofing on Coup Attempts and Coup Outcom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1(1): 158-182.

Pilster, U. & T. Böhmelt. 2012. “Do Democracies Engage Less in Coup- Proof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me Type and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8(4): 355-372.

Powell, J. & C. Thyne. 2011. “Global Instances of Coups from 1950 to 2010 A New Datase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8(2): 249-259.

Powell, J. 2012. “Determinants of the Attempting and Outcome of Coups d’éta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6(6): 1017-1040.

Powell, J. 2014. “Trading Coups for Civil War.” *African Security Review* 23(4): 329-3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Quinlivan, J. T. 1999. “Coup-Proofing: Its Practice and Consequences in the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2): 131-165.

Roessler, P. 2011. “The Enemy Within: Personal Rule, Coups, and Civil War in Africa.” *World Politics* 63(2): 300-346.

Ross, M. L. 2015.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the Resource Curs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8(1): 239-259.

Rustad, S. A. & H. M. Binningsbø. 2012. “A Price Worth Fighting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Conflict Recurr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9(4): 531-546.

Singer, J. D., S. Bremer, & J. Stuckey. 1972.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Peace, War, and Numbers*, eds. Bruce M. Russett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Beverly Hills: Sage, 19-48.

Skocpol, T.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bek, D. 2010. “Masters of Their Domains: The Role of State Capacity in Civil War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7(3): 267-271.

Tarrow, S. 2011.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3ed ed.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World Bank. 201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Thyne, Clayton L. 2006. “Cheap Signals with Costly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0(6): 937.

Tilly, C., ed. 1975.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1st ed.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 ed.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Toft, M. 2009. *Securing the Peace: The Durable Settlement of Civil Wars*.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 N. d. “UCDP Conflict Encyclopedia.” in https://ucdp.uu.se/. Latest update 16 September 2019.

Venables, A. J. 2016. “Using Natural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Why Has It Proven So Difficul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0(1): 161-184.

Walter, B. F. 2006. “Building Reputation: Why Governments Fight Some Separatists but Not Other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0(2): 313-3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ulf, E. & F. Mesko. 2013. “Guide to a Post-Conflict Mali.” in http://tinyurl.com/y3bls7bw. Latest update 16 September 2019.

Young, J. 1996. “The Tigray and Eritre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s: A History of Tensions and Pragmatism.”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4(1): 105-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武裝部隊的忠誠與團結對內戰發生之影響

以下爲統計模型的健全測試（robustness test），包括變更其他變項，採用同一概念但不同意義的變項、增加控制變數等測試，這裡沒有使用其他模型來預測，因爲依變數的性質較適用 logit 回歸。以下所列統計結果多數在正文中有提及。以下就分析結果作簡單說明：

- 表 1 單純將假設 1 的兩個變項分別與假設 2 的變項做估計，結果不變。
- 表 2 加入 Fearon 與 Laitin (2003) 關於族群多樣性與山地佔比的資料，由於資料範圍限制，會減少觀察值約 1/3。但是本文三個自變項仍然達到統計顯著水準。另外 Fearon 與 Laitin 的兩個變數也達統計顯著，呼應他們的發現。
- 表 3 將 5 年內發生政變改爲當年度發生失敗政變，結果達到統計顯著（$p<.001$），影響仍然爲較易促成內戰爆發。由於是失敗政變，代表政府仍然掌握政權，而內戰的挑戰並不是來自發動政變的團體，這與本文的假設符合。看到政府受政變挑戰的第三方，會因此認識到政府強制力的虛弱，進而更願意反抗政府。
- 表 4 將軍隊人數與人口數取自然對數，不同國家之間人口數量差距龐大，可能影響統計結果。兩個變項取自然對數後，假設 2 的「競爭軍事組織程度」變項失去統計顯著。主要影響結果的變數爲人口數。
- 表 5 爲回應審查意見所額外做的估計嘗試。政府和叛軍都可能獲得外國軍事援助，就本文而言，對政府的援助較爲重要，因爲有外國政府援助，尤其是強權的援助，將使政府更容易滿足武裝部隊的需求、確保他們的忠誠、並建立強大的打擊力量，武裝部隊與政府的緊密結合以及佔優勢的鎮壓能力，使潛在叛軍不輕易掀起叛亂。此處模型使用 Cunningham (2016) 資料中的兩個變項，一個代表該國在美國安全體系中的階層，另一個變項單純指出是否爲華沙公約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員。在四個模型中，只有華沙公約成員在模型 13 中達到統計顯著，因此無法證實與強權建立軍事關係對內戰爆發的影響。不過這僅僅是初步的統計結果，要研究這個課題，必須更深入瞭解外部支援對國家鎮壓能力的幫助，比如衣索比亞的案例，蘇聯在冷戰時期向新興國家派出許多軍事顧問，並提供軍火。古巴也多次輸出革命戰士，協助掀起社會主義革命。這些援助如何影響潛在叛亂份子的判斷是相當有趣的課題，但可能需要另起文章來討論。

表 1　假設 1 兩個變項分開與假設 2 變項做估計

	(1)	(2)
失去武裝部隊支持	1.744***	
	(0.295)	
五年內失敗政變		0.939***
		(0.233)
競爭軍事組織程度$_{(t-1)}$	0.226*	0.316**
	(0.113)	(0.109)
武裝部隊人員數	-0.0000548	-0.00000773
	(0.000168)	(0.000186)
總人口數	0.00000162	0.00000165
	(0.00000112)	(0.00000128)
軍事政權	-0.294	-0.219
	(0.355)	(0.378)
民主國家	-0.463	-0.517*
	(0.242)	(0.248)
log 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0.130**	-0.111*
	(0.0502)	(0.0523)
自然資源租金	0.0128**	0.0127*
	(0.00480)	(0.00528)
外債總額	2.91e-12	3.53e-12
	(2.83e-12)	(2.88e-12)
稅收佔 GDP 百分比	0.0181*	0.0171
	(0.00890)	(0.00903)
常數	-2.549***	-3.036***
	(0.455)	(0.535)
觀察值數量	5719	5719

資料來源：作者依本文使用之資料庫製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2　加入 Fearon 與 Laitin 族群分裂程度與崎嶇地形作為控制項

	(3)	(4)	(5)
失去武裝部隊支持	1.792***		
	(0.229)		
五年內失敗政變		0.928***	
		(0.181)	
競爭軍事組織程度$_{(t-1)}$			0.297*
			(0.119)
族群分裂程度	1.332***	1.506***	1.180***
	(0.295)	(0.302)	(0.310)
山區地形佔比	0.00874*	0.00972*	0.0100*
	(0.00352)	(0.00385)	(0.00414)
武裝部隊人員數	-0.000101	-0.0000447	-0.000439
	(0.000288)	(0.000317)	(0.000300)
總人口數	0.00000203	0.00000188	0.00000238
	(0.00000169)	(0.00000176)	(0.00000130)
軍事政權	-0.194	-0.109	-0.136
	(0.295)	(0.278)	(0.363)
民主國家	-0.417	-0.344	-0.459
	(0.238)	(0.238)	(0.271)
log 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0.0369	-0.0539	-0.103
	(0.0352)	(0.0349)	(0.0581)
自然資源租金	0.0117	0.0135*	0.0119
	(0.00687)	(0.00668)	(0.00645)
外債總額	5.81e-12	7.81e-12**	7.17e-12*
	(3.56e-12)	(2.89e-12)	(2.88e-12)
稅收佔 GDP 百分比	0.0343**	0.0313**	0.0259*
	(0.0110)	(0.0106)	(0.0115)
常數	-3.582***	-3.716***	-3.206***
	(0.282)	(0.303)	(0.570)
觀察值數量	6439	6439	4051

括弧內為健全標準誤，表格省略時間序列控制變項。*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作者依本文使用之資料庫製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3　將五年內政變改為當年度發生失敗政變

	(6)	(7)
當年發生失敗政變	1.849***	1.989***
	(0.248)	(0.326)
競爭軍事組織程度(t-1)		0.307**
		(0.110)
武裝部隊人員數	0.000105	-0.0000292
	(0.000264)	(0.000185)
總人口數	0.00000162	0.00000165
	(0.00000169)	(0.00000122)
軍事政權	-0.0524	-0.221
	(0.275)	(0.371)
民主國家	-0.433	-0.481
	(0.229)	(0.252)
log 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0.0508	-0.120*
	(0.0297)	(0.0505)
自然資源租金	0.0152***	0.0134**
	(0.00456)	(0.00510)
外債總額	2.87e-12	3.45e-12
	(3.53e-12)	(2.79e-12)
稅收佔 GDP 百分比	0.0221**	0.0170
	(0.00843)	(0.00913)
常數	-3.044***	-2.867***
	(0.225)	(0.471)
觀察值數量	8189	5719

括弧內為健全標準誤，表格省略時間序列控制變項。*p < 0.05, **p < 0.01, ***p < 0.001
資料來源：作者依本文使用之資料庫製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4　將軍隊人數與人口數量取自然對數以減少誤差

	(8)	(9)	(10)	(11)
失去武裝部隊支持	1.768***			1.693***
	(0.228)			(0.297)
五年內失敗政變		0.986***		0.852***
		(0.179)		(0.252)
競爭軍事組織程度$_{(t-1)}$			0.154	0.102
			(0.128)	(0.148)
log 武裝部隊人員數	-0.149	-0.151*	-0.156	-0.129
	(0.0761)	(0.0761)	(0.103)	(0.114)
log 總人口數	0.428***	0.468***	0.428***	0.406**
	(0.0983)	(0.102)	(0.120)	(0.135)
軍事政權	-0.254	-0.208	-0.158	-0.643
	(0.290)	(0.296)	(0.361)	(0.423)
民主國家	-0.577*	-0.516*	-0.545*	-0.496
	(0.228)	(0.227)	(0.254)	(0.263)
log 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0.0292	-0.0483	-0.102*	-0.0920
	(0.0320)	(0.0319)	(0.0513)	(0.0616)
自然資源租金	0.00938	0.0113	0.00876	0.00949
	(0.00674)	(0.00659)	(0.00610)	(0.00695)
外債總額	4.20e-12	5.27e-12	4.25e-12	5.02e-12
	(4.99e-12)	(4.42e-12)	(4.28e-12)	(5.27e-12)
稅收佔 GDP 百分比	0.0294*	0.0281*	0.0232	0.0247
	(0.0119)	(0.0116)	(0.0121)	(0.0136)
常數	-6.132***	-6.544***	-5.566***	-5.988***
	(0.756)	(0.786)	(0.981)	(1.142)
觀察值數量	6868	6868	4549	4549

括弧內為健全標準誤，表格省略時間序列控制變項。*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作者依本文使用之資料庫製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5　該國在美國安全體系中的角色或蘇聯領導下的集團成員

	(12)	(13)	(14)	(15)
失去武裝部隊支持	0.946***			0.815***
	(0.192)			(0.244)
五年內失敗政變		1.838***		1.827***
		(0.252)		(0.294)
競爭軍事組織程度$_{(t-1)}$			0.320**	0.245*
			(0.104)	(0.121)
該國在美國安全體系中角色$_{(t-1)}$	-0.411	-0.368	-0.127	-0.158
	(0.250)	(0.227)	(0.278)	(0.319)
華沙公約組織成員	-1.895	-1.971*	-1.644	-1.448
	(1.012)	(0.995)	(1.115)	(1.115)
武裝部隊人員數	-0.0000145	-0.000104	-0.000111	-0.0000936
	(0.000172)	(0.000138)	(0.000129)	(0.000148)
總人口數	0.00000175	0.00000195	0.00000146	0.00000168
	(0.00000156)	(0.00000147)	(0.00000132)	(0.00000146)
軍事政權	-0.0260	-0.143	-0.111	-0.603
	(0.300)	(0.279)	(0.354)	(0.410)
民主國家	-0.481*	-0.507*	-0.541*	-0.467
	(0.236)	(0.230)	(0.249)	(0.249)
log 人均國民生產毛額	-0.0642	-0.0604	-0.132**	-0.118
	(0.0385)	(0.0381)	(0.0509)	(0.0620)
自然資源租金	0.0152**	0.0138*	0.0127*	0.0154**
	(0.00588)	(0.00596)	(0.00531)	(0.00589)
外債總額	6.55e-12*	4.68e-12	6.45e-12*	6.61e-12
	(3.29e-12)	(3.63e-12)	(2.97e-12)	(3.66e-12)
稅收佔 GDP 百分比	0.0175	0.0184*	0.0122	0.0143
	(0.00921)	(0.00933)	(0.00997)	(0.0110)
常數	-2.923***	-2.727***	-2.506***	-3.032***
	(0.342)	(0.292)	(0.442)	(0.594)
觀察值數量	7372	7372	5341	5341

括弧內為健全標準誤，表格省略時間序列控制變項。*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作者依本文使用之資料庫製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Impact of Armed Forces' Loyalty and Cohesion on the Onset of Civil Wars*

*Ping-kuei Che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state's control over its security forces and the onset of civil war. A government-controlled force represents a state's capacity to deter and repress armed rebellion. Whether armed forces are willing to follow orders and fight for the government or not represents its capacity to repress rebellion. This is a main factor that is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rebels plan to initiate an armed conflict. More autonomous armed forces, or an internal split within the forces, could weaken a state's capacity for repression. Rebels are more inclined to begin rebellions under these conditions. Using the UCDP data between 1946 and 2014,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their armed forc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ecords of defection in the security sector, experiencing a coup d'état, or having divided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civil war.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successful deterrence against armed rebellion depends on strong cohesion between a government and its armed forces. Rebels are more sensitive to the information of their government's capacity to mobilize rather than the size and equipment of the government forces.

Keywords: Armed Forces, Civil Wa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 DOI:10.6166/TJPS.201906_(81).0002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pkchen@g.nccu.edu.tw.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